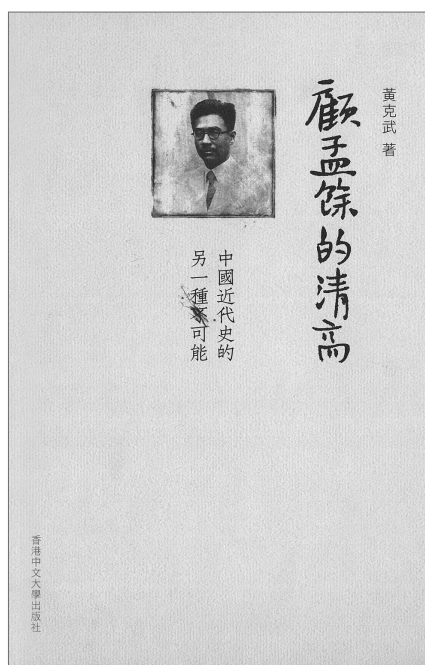


# 把人物傳記帶回歷史研究

## ——評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

● 李志毓



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

中國傳統史學是一門重視「人」的學問。自太史公創立紀傳書表以來，「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

述典章經制」。歷代史家，默識前言往行，將有影響的人物之功業、人格、德行、命運寫入歷史；在時會、勢運中，探究其成敗得失，反思其人生意義，昭之後世，使人有所鑒戒，知觀時處變，立身行事，而有所為。這一史學精神依靠紀傳承載，綿延兩千餘年，然而自近代「新史學」興起以來，已漸漸淡出史家的視野。近數十年，受西方社會科學與史學潮流影響，傳記史學更趨邊緣。在西方，「隨着社會科學概念的傳播，在20世紀70年代，只有集體傳記與類型傳記才能凸顯它們的地位，而個人化的生活描述被視作保守的、在理論與方法上屬於抵抗型的類型，最多在心態史方面還有意義」<sup>①</sup>。在中國，回看近二十年的專業史學研究，也發現有深度、有影響力的人物傳記愈來愈少。傳記被交給了歷史小說和通俗讀物，專業史家則更強調在各種「問題意識」之下，搜尋各種「結構」的網環。

論政治地位和歷史影響，顧孟餘都不算「偉大」，但他所牽扯到的各方面關係卻很重要。顧一生謹言慎行，處事低調，且留作不多，為學術研究造成很大困難，故前人著述寥寥。

《顧孟餘的清高》是第一部關於顧孟餘的研究專著，不但填補了相關研究的空白，對於進一步了解汪派和國民黨左派的思想路線與政治性格也具有重要意義。作者打通思想史與政治史視野，深入研究從政知識份子的思想性格與跌宕人生。

雖然學術潮流如此，但人物傳記對於中國近代史、尤其政治史研究，仍有不可替代的意義。首先，傳記雖只記述個人生平事迹，但時代背景、社會狀況、學術思想、政治局面，都融匯其中，有利於形成整體性、連續性的歷史理解，避免碎片化的弊端。其次，研究政治人物，更直接有助於反思近代中國政治擔當者的問題。一個政治人物或集團領袖，有着怎樣的目標和主張，有無實現主張的方式和能力，有無鬥爭的意志和手段，能否聚集人才和力量，個人出入進退的選擇和性格精神對人一生的影響，都可在人物研究中加以闡釋追問。知道了主體的行動能力，方能進一步探析個人禍福成敗的根源，以及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問題。

甚麼樣的人物應為之作傳？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列舉了以下七種：第一，思想及行為與時代的關係較緊密的；第二，一生事業或性格有奇特處，發生影響或值得表彰的；第三，舊史不詳的；第四，從前史家因偏見或挾嫌記載不實的；第五，政治家列傳過於簡略的；第六，與中國文化政治關係密切的外國人；第七，近代人物中學術事功比較偉大的<sup>②</sup>。就以上幾點來看，對於顧孟餘其人，實有為之作傳的必要。

顧孟餘(1889-1972)是一個現代知識份子，早年留學德國，畢業於柏林大學。1920年代回國後，受聘北京大學德文系、經濟系，擔任主講教授兼系主任，五次出任北大教務長。同時，他又是中國國民黨政客，1926年在國民黨第二次

全國代表大會中當選過中央執行委員，後歷任國民黨中央委員、宣傳部長、鐵道部長等職。他在政治上長期追隨汪精衛，與陳公博並稱「顧陳」，是汪精衛集團(汪派)在政治上的左膀右臂；抗戰期間因反對汪對日求和，棄汪投蔣。1940年代出任過中央大學校長，1950年代在香港領導親美反共的「第三勢力」運動。論政治地位和歷史影響，顧都不算「偉大」，但他所牽扯到的各方面關係卻很重要。他畢生懷抱民主訴求，希望中國能建成一個開放、寬容的民主政體，代表了不少歐化知識份子對中國的期許。但顧一生謹言慎行，處事低調，且留作不多，為學術研究造成很大困難，故前人著述寥寥。

《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引用只註頁碼)是第一部關於顧孟餘的研究專著。本書以充實的資料、詳盡的研究，呈現顧一生的思想與政治活動，使一個歷史中忽隱忽現的身影獲得了清晰的面目。全書共八章，除導論和結論外，其餘六章分別從顧的早年生涯、作為左派要人、參與汪蔣合作、「豔電」事件前後、「第三勢力」活動幾個時期，論述其一生的思想主張與政治活動，不但填補了顧孟餘研究的空白，對於進一步了解汪派和國民黨左派的思想路線與政治性格也具有重要意義。作者黃克武先生精研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著有多部關於梁啟超、嚴復等近代思想人物的專著，故能突破一般政治史專注權力鬥爭的局限，打通思想史與政治史視野，結合思想與政治行動分析，深入研究如顧孟餘一類